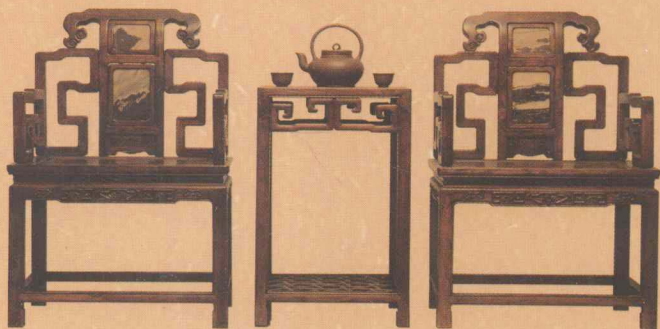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 第二版 |

Face,
Favor and
Reproduction of Power



翟学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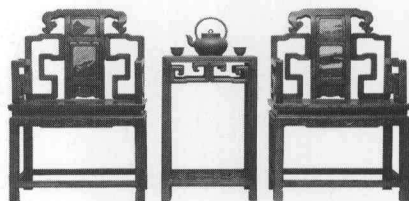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063381

C91-53
22-2



Face,
Favor and
Reproduction of Power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 第二版 |

翟学伟 著



C91-53
22-2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翟学伟著. —第2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301-22873-9

I. ①人… II. ①翟… III. ①社会学—研究②社会心理学—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2438 号

书 名: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 翟学伟 著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873-9/C·092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hlgws0380@sina.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21.25印张 310千字

2005年5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2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3.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第二版自序

拙作《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初版于八年前。当时编写此书的动力,是因为北大出版社有计划出一套由华人学者自己写成的社会理论论丛。这其中似乎隐含有这样一层意思,即从事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者并非全部来自西方,华人学术界还是有人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后来这个计划因故搁浅了,其他相关著作大都并入了未名社科菁华丛书,而我的书则归入了社会学文库。其实,此书的初版自序里多少记述了这一计划,只是读起来会让人疑惑不解。

此书出版后,共印了三次,发行量已逾万册。总体上讲,评价是积极的,问题自然也不少。现在回过头来反思我的这些成果,首先依然自我感动的,还是我的勇气。我们模仿、吸收、批判乃至摧毁一些西方的学说、理论、流派并不难,难的就是我们能立起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我在研读西方社会学理论书籍时,常常自发感慨,以为西方社会学理论家们有两个方面很了不起:一是他们有非凡的学术能力,尽可能不留余地地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的或感受不到(由数据提供)的现象提炼成一些严谨而切合的理论模式,并不断推陈出新;二是他们有一种广阔的心胸来跨越地区差异,尽可能地把这些理论模式建立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之上。这最终导致了其他非西方学者只能穷其一生来追随、研究、评价其中的一家一言,或者一个人物的思想生平。由此两点来比照非西方地区的学者,他们多少就显得渺小和可怜。他们自我定义身处学术边缘,对西方学术心悦诚服。为了让自己的学识强盛起来,他们恨不能把自己全部心思都用在掌握这些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上面,哪怕掌握其中的一小部分也心满意足。因为唯有这样,他们才能给自己壮

胆,也才能对他人评头论足。

所以我想,如果一个中国学者要想在西方人几乎不留余地的缝隙中来挖掘自己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不说是痴心妄想,起码也是自讨苦吃。且不说这其中一样要关乎此人是否具有很强的学术能力,能把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转化为理论,他首先要有的,便是这勇气。当然,以中国学术界的现实情况来看,即使他有了这样的勇气,也下了力气,可还是不行,还有取悦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成果一旦流布发表,它们还面临或被声讨,或被冷落的处境;最大的可能则是让它自生自灭,成为“绝学”。虽然我知道自己资质平平,并面临着这样的困局,但我还是想以我的独立思考,来认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并尝试建立本土的社会学模型或理论。

我想,生活于中国的每一个人,包括外来工作或做短暂停留的人们都会意识到,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就是“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与权力运作等。关系作为一个概念,不单是中外社会学家看到的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工具,还是普通中国人自己再明白不过的生活常识;同样,关系也不是哪个社会学家的重大发现,而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心知肚明的行事原则。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常识般地知道:关系是可以取代制度的;一切在其他社会本应作为制度性的功能,在中国都可以让位给关系来运转;而当中国人在一些事务运作中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有“关系”时,那也不是因为有一套号称“社会资本”的理论在教会他们如何建立社会网络,而是那些压根儿就不懂社会学的人们都能意识到:他的生活道路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所以,在中国研究关系现象,不同于西方社会学中的许多专业概念。那些概念不过是由学者们创立并加以运用的解释性的或测量性的工具,是社会学家们自己的事;而关系却是每个中国人必须懂的事,是他们每天必须应对的:迎来送往、请客送礼、应酬打点、八面玲珑、溜须拍马、拉帮结伙、处心积虑、阳奉阴违、勾心斗角、排斥异己,当然也有同舟共济、雪中送炭、侠肝义胆、感恩戴德、荣辱与共等等。这些现象虽被国人心领神会,但如何被理论地建构与叙述,以便更有效地解释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则显得尤

为重要和迫切。在中国,关系研究得好不好,并不是由几个相关领域的社会学家来评说的,而是由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评说的。几个专家讲好,普通人说不好,我们不能轻易地说,普通人不懂,专家懂;反之,普通人说好,专家说不好,我们却可以自鸣得意。因为我们或许真比专家看得清楚,此即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以为,一个本土研究者的研究起点完全可以这样设问:目前中国的一大批专家学者怎么了?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民间智慧、默会知识、流行段子和歪门邪道是最发达的。前者已部分地放入我的书中,后者可以在此试举几例:比如从地沟油提炼成正品油到山寨品打败名牌,从“华南虎照”到“假文凭可以在官网上获得验证”,从各种行业的业余级选手打败专业队伍再到古玩赝品蒙蔽专家眼睛,乃至最终打败科学仪器的检测等,比比皆是。更加需要警惕的是,专家与对手之间竟然还会里应外合,玩起了双簧,透露出这个社会之“戏份”的隐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也发生在其中,而不在经济学家们的模型中。很多时候,专家被戏谑为“砖家”,成为“不可信”的代名词。他们除了以专家身份自居外,往往在抓瞎,在纸上谈兵。同理,社会学家也自认为,如果依照一套日趋成熟的调查方法去设计问卷,然后认真地确定抽样框进行抽样,实施调查,输入数据,统计运算,就可以得到科学的结论。可没想到的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经常被那些问卷填答人、被访者、信息提供者乃至雇佣的员工们开涮。关于中国人的理论,如果不注意这点,只按程序走,做出来的成果很多是自欺欺人的。我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我们要深入生活,向民间智慧、默会知识乃至段子学习,向许多爆料人、记者、制片人和作家致敬。只有他们才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和现实图景。于是,我在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同时,更加喜欢并浏览他们的作品,也关照自己的生活样态。我希望把我观察到的、阅读到的和体会到的这些社会现实转化成学科中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架构,也自己尝试做些初步的经验研究。我就这样一路走来,走到今天。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多多少少还是看到了西方社会学中没有言说过的部分;我

终于发现,还有一些“学术余地”深藏于中国社会之中;我也领悟到了,一个中国学者的使命应该是把这一宝藏做成同西方社会学理论一样好的东西,并让它们不只属于地方,而属于世界。可令我惊讶的是,八年下来,有关中国人的关系、人情、面子和权力等理论方面的探讨,依然是个冷门。学术与生活之间如此冰火两重天,是不可思议的。由此,我也不无遗憾地想,我本人也就这点能耐,凭我一人之力这样走下去,又能走多远呢……

借此书重印,我做了不少修订。首先,我将此书的所有文字都重新梳理、润色了一遍,尤其对“事实再现的文学路径”“在中国官僚作风与技术的背后”及“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等几篇论文做了较多的修订;另外,我还去掉了原书的最后一篇,增加了我上世纪90年代的一篇旧作“土政策的功能分析”以及我于2010年春季在北大举办的“人文与社会:跨学科系列讲座”上的一次演讲。之所以做这样的取舍,是因为“土政策”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权力与权宜方式,符合本书的主题;而选用一篇讲演记录,则因为它可以较通俗而完整地反映我这几年的研究取向和思考理路。读者借此演讲,大体可以看出我这些年来逐渐汇聚而成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总体研究框架是什么样子的,也算初步实现了我初版序言中留下的一个夙愿,逻辑地展示我曾在不同侧面研究过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最后,我想借此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因为得到这次修改再版的机会,让我的个人作品系列构成了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三部曲。它们是:《中国人的脸面观》《中国人的关系原理》及《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翟学伟

于2012年春节

自序

接到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打来的电话,让我收集整理我有关社会理论方面的论述,由北大出版社结集出版,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和为难。其主要原因是,我并非一个从事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因此也不能肯定自己发表的作品,哪些可以归为此类。或许,最终促使我还是能将发表在不同专业杂志上的论文冠以社会理论之名凑在一起,不过是因为我在从事本土社会的研究中,一旦遇到一些绕不过去的理论问题,尚能勇于面对它们罢了。

其实,在经验研究中直面乃至解决遇到的理论问题,本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欧美学者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大多也来源于此。然而许多中国学者往往在这个时候却不能直面,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照搬或移植西方的相关理论去了。在他们看来,理论与方法的问题必须是西方的,经验研究可以是中国的。为此,我眼中的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大至分为三种:一种是那些本身就在研究取向上对理论问题感兴趣,专门从事理论思考与研究的学者。他们往往喜欢对社会现象和问题做概念上的、类型上的、演绎上的和批判性的研究。我以为,他们算真正的社会理论家。另一种人是在其解决现实的、经验的或实证的问题时,遇到了解释上的、视角上的和方法上的难题,这时诸如概念、方法论、模式及理论上面的一系列问题都出现了。若不直面和解决这些理论问题,会导致有关经验研究进行不下去,或者变得无的放矢。当然这不是说所有遇到这类问题的学者都会关注理论问题。对于那些只对经验研究感兴趣的学者,他们通常会将这些问题交给理论家去处理;假如他们愿意自己腾出手来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在这一点上就会

产生一些理论性的成果。我的情况显然属于这一种。还有一种则是那些致力于介绍和评述西方理论的学者,他们在国内外文资料难得的情况下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我始终认为,评介理论和从事理论研究是两回事(有的时候很难分得清,是因为有的学者两者兼而有之)。虽然深入系统地领会和评介已有的经典理论(包括思想传统)对于建立任何新(本土)的理论都是必需的,似乎也没有哪种理论不借助前人的成果,就可以凭空地建构出来,但介绍和评述在本质上应该是为前两种人的理论开拓服务的。如果一个社会中所呈现出的研究状况是前两种人太少,而后者太多的话,那么该社会的社会理论研究非但不繁荣,而且贫乏。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从事本土的研究,也有机会同两岸三地的同行在一起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如何从事本土的经验研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启用本土的概念来获得经验性的结论,或者说在经验研究中得出了同西方学者相反的结论,然后做一番中国文化的解释。所谓本土研究(或通常所讲的本土化研究),是一个理论上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本土研究的深入,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比如本土研究是否就是对本土社会里的成员的研究;本土研究是否就是通过寻求本土概念来从事实证研究;本土研究是否就是因为有了不同于西方研究的结论需要给出本土的解释;本土研究是否意味着自己也能寻求新的研究范式、视角或研究方向;本土研究是否可能在方法论上找到西学学术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结合点等等。我正是带着这些问题来从事我的具体研究的,也是通过具体研究最终从理论上来思考其中的答案的。随着我的这些思考逐步地展开,我也就不再囿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自身来回答这些问题了,而多多少少看到了东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对世界的理解、学科类型划分及叙述方式的差异和对话等问题。对于这些触及哲学、历史、文化及学术传统的探索,我看也只有用社会理论来涵盖了。

收集在这里的论述,是我自从事研究以来前后整整十年发表的有关作品。当我把它们放在一起后,我才知道自己这些年都做了什么,哪些是已经取得的成绩,哪些是存在的、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当我

看到自己这些年在讨论本土理论怎么做较为可行的时候,我为自己没有做一个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而感到欣慰和自豪。且不论我的理论尝试是多么地不自量力,也不论这些尝试是否成功,单就这些尝试本身已足以说明我的勇气。另一方面也的确形成了不少初步的框架、概念、模式和方法。但罗列出这些论文后,我看出我现在的最大不足是,我的研究单独地看都尚能自成逻辑体系,但既然它们都是关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现象和生存方式,如何能让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一种逻辑关系,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应该说,我收在这里的最后一篇论文是我对以往研究做的一个统筹的逻辑安排,即将我在不同时期产生的不同研究成果整合到了一个统一的逻辑分析框架中来了。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框架仍然是一次尝试。如何将它完善起来,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我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次结集的依据及其想法。这次结集,我的理论性论文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的探讨。首先是我本人对如何从事本土研究的阐述。其中有社会学的、有心理学的、有社会史的,也有面向本土社会科学的。我现在在这一方面最需要探讨的问题有二,一是本土社会与心理方面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其方法论究竟是什么,二是这方面的探讨如何能在操作化的层面得到实现?这两个问题从我一进入本土研究时就一直困扰着我。我为此不断地收集资料,有些想法已在这些论文中提出来了,但专题研究凭我目前的学识和功力,是写不好的,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其次,收进来的一些论文的起点本是做经验研究的。但如前面所说,为了弄清概念的含义,或是为了让经验研究的结论同西方有关理论做比较,最后也需要回到理论上回来回答一些问题,我也就把它作为理论性的论文来看待了。另有一方面的论文是我尝试建构的几个具体的本土理论模型,它们最终对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解释力如何,或许需要实证检验及至于时间上的考验。

翟学伟

2003年11月20日于南京寓所

目 录

第二版自序/1

自 序/1

一、研究视角与方法篇

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反省、批判及出路/3

儒家的社会建构

——中国社会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论的探讨/25

心理学本土化之我见

——从本土概念向本土研究方法的转化/50

事实再现的文学路径

——建构社会与行为科学中的人文方法/70

二、关系模式研究篇

中国人际关系模式/93

中国人关系网络中的结构平衡模式/110

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

——也论关系强度与求职策略/131

三、脸面与人情研究篇

中国人脸面观的同质性与异质性/153

在中国官僚作风及其技术的背后

——偏正结构与脸面运作/168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197

四、社会运作理论篇

“土政策”的功能分析

——中国地方与组织领导的权力游戏/219

中国人在社会行为取向上的抉择

——中国人社会行为变量的考察/232

个人地位

——中国日常社会学理论的建立/261

社会系统、关系运作与权威结构

——在北京大学的讲演/285

索引/319

目 录

目录

目 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一、研究视角与方法篇

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反省、批判及出路

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的运动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华人学术界逐渐开展。比较而言,它的发展在各地显得不太均衡,其中以台湾地区开展的时间最早,热情最高,讨论最热烈,成果也最多,香港其次,而大陆相对滞后。从直觉上判断,造成这一格局的原因主要同一个地区的学术带头人的学术旨趣、学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及研究资金投入的方向和要求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我的这一直觉判断没错的话,那么中国大陆目前所处的学术氛围在这几个方面都还比较欠缺,也就是说,由于大陆的社会与行为科学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因此,一方面“改革”必然带来政府对学术应用性成果的需求,许多社会科学的价值是在政策导向、政策咨询及其相关的基金投入中得到体现的;另一方面“开放”又引导学者尽可能多地向外学习和借鉴,此时学术的评价标准往往是以知道、学习和引述外国东西的多少来衡量的。

由于我身处中国内地,却一直在从事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研究,且不在台港两地的本土化研究圈内。这就使我有机会站在一个“边缘人”的角度来独立地思考和检讨这 30 年来的本土化运动与西方学术体系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此之间取得平衡才算合理等这样一些较为根本性的问题。现在,我将这些思考和自己的实践体会写出来。需要申明的是,我的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对这 30 年来的这场运动做出客观的评价,主要目的只是将我认为值得探讨的问题提出来,以期获得更多的学人来思考和关心。当然面对这些问题,我也试图提出一些我自己的初步看法,而这些看法仅仅是方向性的,也就是说,我不可能对一些重要问题详加阐发和做缜密的论述。

一、本土化的理想与现实之检讨

回顾近 30 年来的研究,我发现,本土化研究的发生与展开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学者们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在西方学者规定的研究框架里做研究,接着逐渐转化到其结论的对立面上来做结论,现在已发展到多元化的局面了。比如,我们原先的许多研究只知道用西方的现成理论、概念、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中国人与中国社会,从不考虑它们同研究对象及其社会文化的脉络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不同社会成员对自己的社会有没有不同的预设等问题。随着本土化研究在华人学术界的逐步开展和深入,尽管上述问题已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比较文化上的二元对立倾向又随之暴露出来,即我们从原来的生搬硬套西方成果转向了在西方许多研究的对立面上来呈现自己的社会与文化特征,诸如西方人的价值是个人主义的,中国人的价值是集体主义的;西方人的行为是普遍主义的,中国人的行为是特殊主义的;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西方社会代表着现代性,中国社会代表着传统性等等。看起来,这样的研究比照搬西方理论与方法或一味验证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或进步,而且从结论上看也很贴近中国实情,但这类研究很轻易地就把中西文化摆在了比较的两极,好像它们之间始终泾渭分明一样。再者,现在的多元化格局尽管造成了更多的讨论空间,不同的学者在其中可以寻找自己的视角和方法^①,但这未必就意味着本土化有了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因为走投无路或东张西望都可能导致多元化。比如原先的套用和二元对立也还在继续潜在地发展着,它们本身也构成了本土多元化中的一个部分,或许还是主流。在这种情况下,我注意到杨国枢近来提出了一个从事本土化研究的标准,即“本土契合性”的问题,杨国枢的定义是:

研究者之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之心理行为及其生

^① 参见杨国枢主编的《本土心理学方法论》中的各篇论文,详见《本土心理学研究》1997 年第 8 期。

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脉络密切或高度配合、符合及调和的状态,即为本土契合性(或本土性契合)。只有具有本土契合性的研究,才能有效反映、显露、展现或重构所探讨的心理行为及其脉络。^①

杨国枢此后又写专文阐述这一提法^②,显然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目前(或至少在本土化研究未开展以前),我们的学术研究尚没有达到上述的本土契合性标准,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境界。现在有了这一提法,我们不但可以用它来衡量我们过去所做的研究如何,也可以知道我们下面将怎样进行研究。

本土契合性作为一个具体的操作概念是同本土化这个大概念紧紧扣连在一起的。在我看来,在这个概念背后有一种要让整个学术研究“迫降”的动力。它意味着华人学者应该从西方研究范式中撤回来,西方学者也要从所谓的普遍性原则中收回去,大家都来做同自己社会文化相契合的研究。至于比较普遍性的研究工作则是大家下一步才要做的事。但问题在于,迫降并不能导致本土化的研究可以自发地生长,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面对已经产生影响的西方学术,包括科学哲学、学科架构、研究方法和概念等,同我们要契合出来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关系?具体而言,问题还是回到了杨国枢当年面对西方人的发问,如果没有西方心理学,中国心理学是什么样子?由此而牵连出来的问题还有:欧美学术并没有提出过如此复杂的本土化概念,为什么他们就没有遇到研究过程和结果不够本土的问题呢?或者说,是什么妨碍了我们不能把产生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运用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是因为不产生于本土文化中的研究成果就不能契合于我们的社会?还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同我们对本土社会的认识不一样(或是使用他们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同我们对自己社会的感受(认识)不一样?抑

① 杨国枢:《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关问题》,《本土心理学研究》1997年第8期,第87页。

② 第一次是杨国枢《在我们为甚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一文中提出来的,详见《本土心理学研究》第1期(1993)。